

出版博物馆·研究

# 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 东亚文化交流

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  
出版博物馆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出版博物馆·研究

G 239.29  
8642

# 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 东亚文化交流

复旦大学历史系  
出版博物馆 编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编.—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11  
(出版博物馆文库)

ISBN 978-7-80703-988-4

I. 历… II. ①复…②出… III. ①出版—文化史—中国  
②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东亚 IV. G239.29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2331 号

- 丛 书 名 出版博物馆文库  
书 名 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  
编 者 复旦大学历史系 出版博物馆  
责任编辑 陈冈梁 高明  
装帧设计 严克勤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上海百家出版社(www.bjph.net)  
地 址 上海市瞿溪路 136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37  
字 数 595 000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03-988-4/K·147  
定 价 98.00 元

---

上海百家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上海誉嘉律师事务所

田原律师(13501917060)

商瑜律师(13501679328)

# 从出版史到文化交流史（代序）

郑培凯

（香港城市大学）

记得很久以前，在 1970 年代——因为那段时间在台湾看不到大陆出版的东西——我刚到美国后第一次看到的有关出版的著作，是张静庐先生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我看的真是津津有味。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古籍出版和进入晚清以来出现的现代出版业完全不同，可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不同呢？我认为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就像苏东坡诗写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问题，比如有关书写，有关作者和社会的关系，包括当时的文化氛围、历史环境、时代风气等。

中国的印刷史研究得很好，因为印刷是世界重大的发明，有人认为它是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史研究涉及造纸、纸墨、印刷的制造、雕版业和排印等，到后来科技发展之后，它更是牵涉到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牵涉到社会的整个结构，它实际上也是社会史，是通过特殊的文化载体来表现的一整个社会过程。印刷需要流通、需要有人投资、需要纠集工人，它有商贸的经营，有商业的运作，有批发、有零售，甚至到了近代有书展，其实书展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为，它虽然是一种文化活动，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商业的行为，还出现书会，以前古人有琴棋书画的雅集，现在我们有书会、读书俱乐部，它们背后也有商业运作。这些都和出版史的研究息息相关。

再比如讲到阅读，我们从许多资料看到一些学者文人写的读书感想，甚至写到这些书刊对于他一生的影响。这属于个人的阅读，之外还有更多的牵涉

到阅读的问题,如文化知识的流通,包括书刊的评介,包括读书会的组织,这些也都是出版史可以讨论的。

从方法上来讲,现在有许多不同的领域都介入到了出版史的研究中来,有文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技史、商务史等等。比如文化社会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场域研究是讨论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场域关系,这牵涉到文化传播学。其实印刷和整个文化传播、和传播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出版研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研究的是非文字的、非文献的一些文化问题。2006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口传心授与文化遗产》,里面讲的是昆曲和古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我考虑到它们都是文化的载体——其实文化载体不仅是文字,文字和文献典籍只是我们最熟悉、最主要的载体。进入20世纪,王国维就很清楚地提出地下资料的问题,文物和考古也成了人们公认的文化载体,它们虽然不是文字,但它们所记载的东西是非常清楚的,它们存在于历史当中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些是无形的,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口传心授的东西,这些也都是文化的载体——这些非物质文化的东西该怎么研究,这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我在研究了这些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文字、文献、出版的研究,我发现,其实各个不同领域的研究都是相通的。

出版史是不是文化进步的历史?当然我们讲的是平面出版——现在21世纪有很多非平面的出版方法,特别是电脑高度发达之后,非平面的出版将来也必定是出版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是不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手工到机械化、从精英到普罗?这里面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单线的,问题之间可能有交叉,是个很复杂的关系,会牵涉到很多东西,牵扯到对手工技艺的研究,对科技发展的研究,对艺术审美的研究等等。比如装帧艺术是不是出版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呢?我认为绝对是。装帧不只是一种艺术,它的设计里面有许多商业因素,它利用我们对视觉的感觉来影响我们,这些都是可以探讨、可以研究的。但是我们研究书籍的历史,讨论的比较多的是书的内容问题,对形象的设计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

国外对于出版史的研究,20世纪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法国,大概在1950年代,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出现直接导致了这次飞跃的产生。德国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很大,英美

现在也把它作为研究文化史的很主要的领域。我很简单地介绍几个例子,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思考。

我们讲的传统出版史和新的出版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出版史有很好很优良的传统,因为中国人对书非常重视,而且中国不管是纸张还是出版,在世界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首屈一指的——近代欧美的发展是另外一回事。中国过去对出版史的研究,我认为都集中在如传统的书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甚至藏书版本学,研究珍本、善本等这些方面。西方的研究也是如此,这大概和古董的价值有关,这说明藏书也有它的社会价值,也有与金钱相关的一面。新的出版史的代表主要是年鉴学派的费夫贺(Lucien Febvre)跟国外另外一位学者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于1958年在法国出版了一本《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他们在1950年代就提出一些对印制本,即平面印刷在欧洲发展问题的思考——这里面虽然有一节讲中国的印刷术,但整本书主要讲的不是印刷术如何发展起来的,哪个地方发展快,哪个地方发展慢的问题,而是讲这种平面印刷在欧洲出现后怎么发展、怎么产生了社会的影响、怎么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态度、怎么造成了大的历史的变动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本书对于出版史的研究就联系到各个不同领域和各个不同的面,所以这本书很有影响。

特别有意思的是,年鉴学派对于出版史的研究影响到了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达恩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书中文译本名字为《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它研究了一本书——《百科全书》从启蒙时代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对法国和整个欧洲思想的影响以及它作为一个生意的运作过程和状况。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我们从来都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讨论的,来讲书里面提供的知识,讲它提供的理性思维,讲它后来对造成法国大革命,讲它对人们的思想的改变以及造成的整个社会的运动。而这本书的研究目标却是《百科全书》的生命史,它讨论了写书的人和书商之间的关系,写书商的投资金额和动机,讲《百科全书》出版后有多少不同的版本等等。当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这涉及到出版契约,而法国当时还处于皇权之下,对出版有很严格的规定和控制,可是书里又有很多内容对当时的正统思维、皇权社会以及宗教体系都具有挑战性 or 批判性,那么书商是怎样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是怎么衡量和取舍书中的内容的?这一类

细节,反映出当时很具体的社会生活。

达恩顿为什么能写出这本书呢,因为他找到了日内瓦一个书商当时留下来的档案资料——所有来往的信件,内容涉及他怎么付稿费,印多少本书,在哪里印,印了之后怎么运输,又运到哪里去等等,所以我们得到了从1775年至1880年这个时段《百科全书》发展的非常清晰的情况,使我们得以知道在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中,这部书出了多少的版本,印刷了多少册,在法国国内印刷多少本,法国国外印多少本,日内瓦后来又出的那个版本卖了多少等。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内瓦一个大书商竟然印了8000余册,我们知道,《百科全书》是一套很大部头的书,而在作者研究的这段期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竟然总共印了23400套,那么它是怎么发展到这个程度的呢?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这本书探讨的问题就不是我们狭义的出版,它研究了整个欧洲社会及文化思维的变迁。我们经常说法国大革命之前一定有一些风雨欲来的预兆,那么这本书就把这种状况讲得很清楚。这是研究出版史的一本书,但带给我们很多知识和信息。

后来达恩顿在1982年又出了一本论文集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里面收有文化和社会的议题,特别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了一些东西;1990年他又出版了一个论文集,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这两本书都讲到了他一直讨论的出版问题——出版史研究可以联系到哪些领域,应该怎么来看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达恩顿提出了一个传播的循环线路(Communications Circuits),他把与出版有关的每个环节和整体都放回到历史的现场,不管是书商、契约、版权,还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所谓的智慧财产权。他特别喜欢探讨书商、出版家是怎么来运作的,这个背后最大驱动就是资本问题。他从书商入手来探讨近代的这些问题,探讨书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达恩顿的 *Communications Circuits* 首先涉及的是作者和出版商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中出版商又牵涉到印刷商,印刷商又牵涉到各种的纸张和墨,也有工人的提供,印刷又包括造字、制模等等。接下来是商贸,流通领域的书商有批发商、零售商,还有售书的商店等等。再下来就是读者,各种各样的读者,包括买书的人、借书的人、图书馆、图书俱乐部等等。另外一部分是经济社会结构,这就牵涉到政治和法律的问题,因为有出版的法律,出版的规定,出版的限制,甚至有时有对出版的压制。还有一面就是书的

思想和影响。达恩顿所要讲的就是涉及出版的各个不同的领域,以及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出版,这其实也就是现在我们研究出版史的许多人所考虑的一些问题。

过去我们的出版史,经常研究书目,其实书目和知识结构的关系很密切。以前我们讲《四库全书总目》时,会讲到清朝乾隆以前的有些书变成存目了,有些被禁毁了,我们有许多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也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但因为《四库全书》太大了,所以研究的人就只能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框架,至于具体的某本书在《四库全书》的整个编写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或者曾经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则无从知晓。当然《四库全书》还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印刷,而是抄写,但现在它开始印刷了,而且还有了电子版,我相信若干年后我们再回头看,《四库全书》的流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乾隆以后又有很多的材料,于是再把它们编到《续修四库全书》里。面对出现的很多材料,一个相应的问题就产生了,我们怎么把过去的各种书刊材料纳入我们的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文化框架的呢?像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所见的许多书籍就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这是否和书目及文化史的知识框架很有关系呢?

到了近代,书目的分类就比较容易讲了,比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之后的《书目答问补正》,这些书已经能从书目上看出它和《四库全书》那个时代的想法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经能够看出它在重新建构知识结构了。我觉得周振鹤教授编的《晚清营业书目》很好,里面有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书目,它列出了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书目四种:《文学初阶》、《马氏文通》、《汉文教授法》和《伊索寓言》。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伊索寓言》为什么会被列入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呢?虽然《伊索寓言》可能是符合桐城派文体,古文根基很好,但不管怎么样,里面的知识内容和中国传统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可它竟然会被列入小学堂教科书。这个例子以及这一类问题应该值得研究出版史的人特别去探索,因为它能够探索的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再有,档案馆有非常多的档案资料,比如上海档案馆就为研究专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资料,馆里所藏书底挂号提到当时书业公所有个书底,是1904年以后的57家书商登记的两千余册的书底。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主营新书的书商并没有加入书业公所,这样,所藏书底就不能反映这些新书的状态,而且当时的革命书目也没有被纳入书底。讨论书目很有意思,但我们要

注意以上情况。另外,上海档案馆藏的《上海市书商同业公会全宗档案》里面有书商的账册,账册里面有缴纳助银和月捐银的数量,从这个数量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书商的规模,因为缴纳的数量是书商所在的社区规定的,而社区对书商的经济状况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从捐的助银数量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书商的规模。从账册可以看到,在1890年的捐助中,点石斋、扫叶山房都很多,但到了1906年,点石斋捐的仍然很多,但扫叶山房就明显地落后了,这时我们看到宝善斋、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都变成了捐助的大家。虽然我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但这种变化背后一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这是研究出版史的朋友应该讲给我们听的。书目看上去是最简单的一种东西,但它也能够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文化史方面的信息。

印刷史方面的材料很多,也有很出色的研究著作,如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上、下),还有钱存训的《关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他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是他《中国科技史:纸和印刷》英文本的修订本。但我们看到它们提供的也是一个大的框架,并没有告诉我们它跟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关系。比如明朝出版业最兴盛的地方之一——福建的武夷山区的麻沙与书林,那里出版质量最差的书,但这些书的流通量却是最大的,那么,它给地方带来了什么呢?地方的经济和它的关系是什么呢?我看到有些研究地方史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却没有人从印刷史的角度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可以做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近代出版史和文化交流的关系也很密切,邹振环教授新著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讨论了有关晚清历史方面的文化交流问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继续做的,比如具体做一本、两本书,也可以做这个书的更细致的生命史。大的、宏观的东西很重要,但有了大的宏观的框架之后,更细致地表现它的骨骼、肌体以及生命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展现和影响,则是我这样的研究文化史的人所期待看到的。

研究出版史的资料还是有的,也许前人早已运用过它们来进行研究,但现在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再来探讨它们蕴含的信息。比如我看到《西洋医学入华史稿》,它不是研究出版史的,但它涉及很多西方医学著作的出版和翻译,那么,这些西洋医学的著作是怎么影响我们的医学界呢,这就与出版有了一些关联,这些都需要好好的讨论。另外我看到沈国威教授的《近代启蒙的足迹——

东西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这本书也很有意思。这本书研究了 James Legge (理雅各)给小学生的启蒙教材——《智环启蒙塾课初步》这本 1856 年在香港出版的书。理雅各这本书的内容讲的是西方最简单的知识，可是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新的西方词汇——这些词汇是由传教士和教友翻译的。这些词被翻译成中文之后被传播到了日本，之后又从日本传回中国。我们过去总有一个误会，认为所有我们重要的新名词都是从日本转借过来的，其实传教士和中国的教友因为有很多刊物要出版，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确实，影响中国的很多近代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但也有一些词是从中国传到日本，之后又从日本传回来的，这就是传播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了：一个词被译成汉语之后对中国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深？这个词到了日本之后，通过其他人的介绍又传回中国，比如梁启超，它的传播面是否就不同了，它对中国的影响深度又是多少呢？这些的确是我们研究者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些和文化传播及文化交流有关的议题都和出版史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贡献给整个历史学。所以，以书刊出版为核心，以书刊的传播为关键，受文化影响是重点，文化交流是流韵。同时，这里面又牵涉了时间的维度，即历史的演变；空间的维度，即地域的差异，以及社会阶层与群体意识的不同。现在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是多元的，出版对文化的影响也因社群的差异而不尽相同。

# 目 录

- 从出版史到文化交流史(代序) 郑培凯 (1)
- 中日出版与文化互动
- 《大明一统志》的出版及其东传对日本地志编纂的影响 巴兆祥 (3)
- 从“多识之学”到“博物学”
- 论中日博物图书的双向出版交流 于翠玲 (15)
- 关于明治前期上海的日本人活动
- 以《沪游杂记》和东本愿寺上海别院的  
日中文化交流为例 川边雄大 (27)
- 江南制造局的出版物在日本的传播和利用 陈力卫 (44)
- 论《东瀛诗选》对江户汉诗的鉴选保存之功 陈福康 (61)
- 岸田吟香出版物考 王宝平 (69)
- 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与日语
- 泰东同文书局及其出版物 沈国威 (85)
- 晚清和民国初期中国翻译出版日本农业图书研究 陈少华 (100)
- 清末从日本传来百科辞书之研究 钟少华 (124)
- 解读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发展中的“日本”符号 洪九来 (141)

《满清纪事》、《日本日记》的逆输入和增田涉的有关研究

——兼谈《遐迩贯珍》

黄天 (153)

《西游录》《黑鞑事略》的版本与研究

——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

许全胜 (168)

张元济所藏与日本汉学界人士、机构往来函

陈正卿 彭晓亮 (186)

张元济东瀛访书与海外遗珍的流布

柳和城 (200)

西学东渐与中国出版

明清之际西学汉文著作的中国出版史回顾

张西平 (221)

关于阮元(1764—1849)的两条资料

——阮元晚年的思想倾向和局限性

李庆 (249)

十九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所描绘的英国：

《大英国人事略说》与《大英国统志》

李晓杰 (256)

姜别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与上海美华书馆

冯锦荣 (271)

土山湾印书馆西文资料考述

张晓依 (321)

复制知识

——《国粹学报》博物图画资料来源及其采用之印刷

技术

程美宝 (338)

晚清上海书局名录

张仲民 (359)

水沫书店与1930年代上海北四川路的出版文化

郑瑜 (368)\*

译界巨匠傅雷的出版历程

樊琳 (386)

## CONTENTS

## 东亚出版与文献翻译

## 10—14 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出版交流

- \* ——汉文大藏经的考察 章宏伟 (397)

- 菲律宾印刷始祖龚容与高母羨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 邹振环 (420)

- 日本宝历辛巳版《明史朝鲜传》考论 孙卫国 (438)

## 新嘉坡坚夏书院及其中文书刊对晚清经世学者之影响

- 以梁廷枏《海国四说》为例 庄钦永 (452)

- 美部会澳门印刷所刊印的几部中文工具书 顾 钧 (491)

## “米国”还是“美国”：传教士出版机构对外国地名书写的影响

- 千叶谦悟 (500)

- 晚清国际法翻译的机构和语言 鲁 纳 (508)

- 《格氏解剖学》的中译本 高 晞 (519)

- 日据朝鲜时期日人所著汉籍研究 傅德华 (542)

- 商务印书馆和南洋华侨读物的出版发行 张人凤 (552)

- 会议综述 贾雪飞 高 明 (558)

- 后记 (570)

## 中日出版与文化互动



# 《大明一统志》的出版及其东传对 日本地志编纂的影响

巴兆祥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中国历来有编纂出版总志的传统,而冠以“一统志”之名的总志则始于元代。元、明、清三代均编有《一统志》,除《大元一统志》已散佚外,其余多有传本存世。尽管在后人对三代《一统志》的评价中,《大明一统志》最低,但它的成书历程却较漫长,对日本的影响却最大。<sup>①</sup>

## 一、《大明一统志》的编纂

据顾炎武《日知录》：“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輿地书，至天顺五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sup>②</sup>《大明一统志》的编纂约始于明永乐，止于天顺。期间大体经历三个进展阶段：

第一，起步阶段。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为“昭同轨同文之盛”，曾经下令编纂总志。如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等六人“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sup>③</sup>编成《大明志书》。十七年，为“详载

---

① 有关《大明一统志》的研究，在中国地理学史、方志学著作中以及各影印本的前言中多有简要概述，较详尽的探讨仅见王剑英《明代总志评述》（《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1997年第2期）、张英聘《论〈大明一统志〉的编修》（《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两文。王文重点探讨了《大明一统志》对《寰宇通志》的修订表现，并对前人有关该书评述的不实之处进行了辨析。张文主要通过对编修情况的阐述，论述了《大明一统志》体例、史料价值及其对方志的影响。本文主要在勾勒《大明一统志》编纂三阶段的基础上，探讨明清时期《大明一统志》的东传及其影响。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清乾隆刻本。

③ 《明史》卷九十七，艺文志二。

古今沿革之由”，编《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sup>①</sup>二十七年，又“以舆地之广不可无书以纪之”，令刘基“以天下道理[里]之类总类为书”，纂成《寰宇通衢书》。<sup>②</sup>然由于当时天下初定，各方面的准备还不足，所编总志多是满足某一方面需要的，还不具备编纂一部综合性一统志的条件。到永乐十六年，明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各地方志多有编纂<sup>③</sup>，一统志的编修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大明一统志·御制序》称<sup>④</sup>：

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天下，薄海内外悉入版图。盖自唐虞三代下及汉唐以来，一统之盛蔑以加矣。顾惟覆载之内，古今已然之迹，精粗巨细，皆所当知。虽历代地志具存可考，然其间简或脱略，详或冗复，甚至得此失彼，舛讹舛杂，往往不能无遗憾也。肆我太宗文皇帝慨然有志，于是遂遣使遍采天下郡邑图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书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

《寰宇通志·御制序》也云<sup>⑤</sup>：

皇曾祖考太宗文皇帝尝思广如神之智，贻谋子孙，以及天下后世，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实之凡有关于舆者，采录以进，付诸编辑。

太宗决定编的一统志名曰《天下郡县志》，由夏原吉、杨荣、金幼孜任总裁。为编好这部一统志，朝廷“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sup>⑥</sup>同时再颁《修志凡例》二十一条，划一作为一统志基础的各地方志的体例。惜至太宗去世，书仍未能就绪。

第二，成型阶段。景泰五年七月，代宗以一统志“因循至今，而先至未毕，则所以成夫继述之美者，朕焉得而缓乎？”<sup>⑦</sup>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高谷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礼部奏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员，分行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采录事迹。”<sup>⑧</sup>七年五

① 《明史》卷九十八，艺文志三。

② 《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十四，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③ 弘治《徽州府志·词翰》：“洪武九年春，有旨令各府州县纂辑图志。”《吴郡文粹续集》卷一：“洪武十一年戊午，诏天下郡县纂修志书。”万历《温州府志·艺文》：“洪武十一年夏，浙江‘省部以修图志责成郡县。”万历《寿昌县志》载永乐十年朝廷颁降《修志凡例》十六则，令各地遵守。

④ 《大明一统志》卷首，《御制序》，三秦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

⑤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

⑥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零一。

⑦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

⑧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三。